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全国大学生 毕业论文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黄育海 李庆西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全国大学毕业论文选编
本社编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875 插页2 字数430,000 印数000,001—101,5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196 定 价: 2.55 元

编 者 的 话

近年来，我国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领域，活跃着一支年轻的生力军。他们中间，除一部分自学成才者外，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相继跨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不囿成见，大胆探索，力求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思考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便给文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他们的成绩不仅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新气象。

为着推荐新人，扬励学术，也为着检阅高等院校中文教学成果，我们从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近年毕业生论文中，汇选一部分优秀作品，呈献给读者。我们相信，这对于活跃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尤其对于在大学生和青年文学爱好者中间倡导理论思考的风气，势将有所推动。并且，本书对于一般高等院校（包括电大和其他业余大学）同类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也是一个可供参阅的范本。

本书各篇论文的学术观点，自然都是作者一家之言。其中涉及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引用的某些例证，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商榷，为保存文章原貌，如实地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我们一般不作改动。

关于本书编辑凡例，说明如下：

一、本书论文作者，为各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77级（81届）至79级（83届）本科或专科毕业生。关于作者情况简介和论文指导教师评语均附于论文篇末。

二、本书选收的毕业论文均在报刊上发表过。原刊载处于文末注明。

三、本书按论文课题范围有如下几个方面：1.中国当代文学；2.中国现代文学；3.中国古代文学；4.外国文学、比较文学；5.文艺理论、美学。

四、部分论文收入本书时文字上略有修正，但不影响原文发表时的观点。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全国各高等院校、各院校学报和有关刊物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悃。

希望读者、作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建议，以便重印时订正。

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1984年11月

目 录

从云到火

——公刘新作初探

北京大学77级 黄子平 (1)

忠于生活 思考生活

——评王蒙近作的艺术手法

厦门大学77级 张 帆 (20)

论“思考的一代”文学思潮

华东师范大学77级 宋耀良 (37)

张洁小说艺术特色初探

黑龙江大学77级 吴黛英 (63)

从时、空、人关系看毛泽东

诗词的崇高美

湘潭大学77级 王鲁湘 (78)

王蒙近期小说的语言风格散论

杭州大学78级 曹布拉 (89)

*

*

*

论巴金的文艺思想

复旦大学77级 陈思和 (103)

巴金和法国民主主义

复旦大学77级 李 辉 (128)

试论闻一多关于新诗绘画

美的理论和实践

北京大学77级 江锡铨 (155)

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性格

中山大学77级 陈平原 (182)

跋涉者的第一步

——《跋涉》与萧军创作风格的形成

曲阜师范学院77级 周海波 (197)

孙犁文学观评述

南开大学77级 李瑞山 (209)

*

*

*

“东皇太一”神话考

黑龙江大学77级 张一兵 (222)

论王维诗中的“动”与“静”

广西大学78级 张西宁 (238)

谈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

北京大学77级 夏晓虹 (250)

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

——兼谈如何看待毛氏修订《三国演义》

黑龙江大学77级 李庆西 (262)

《歧路灯》简论

中国人民大学78级 杜贵晨 (292)

*

*

*

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

象的演化及其认识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77级 陈洁 (308)

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

南京师范大学78级 陶思炎 (324)

论浮士德精神

中山大学77级 覃小超 (335)

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自我追求

湘潭大学77级 张维嘉 (350)

*

*

*

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的创作方法

复旦大学77级 邹平 (368)

在现象的因果联系中揭示社会本质

杭州大学78级 金健人 (380)

普列汉诺夫美感理论两个

基本问题的辨析

——兼与计永佑同志商榷

杭州大学77级 耿平 (395)

悲剧观新探

云南大学78级 叶金龙 (414)

西方的丑学 南京大学77级 刘 东 (429)

艺术欣赏的审美特征初探

复旦大学78级 蒋 红 (459)

试论幽默

复旦大学79级 徐 侗 (472)

艺术灵感试探

厦门大学76级 杨健民 (498)

个性化语言浅论

南京师范大学78级 朱 持 (516)

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小说视点初探

南京师范大学78级 高文君 (537)

戴着脚镣跳舞

——论报告文学的想象

四川达县师范专科学校77级 李明泉 (549)

从云到火

——公刘新作初探

黄子平

（法厄同驾驶着他父亲阿波罗的车子），四只有翼的马匹嘶鸣着，空气因它们灼热的呼吸而燃烧。它们离开天上的故道奔驰，并在野性的急躁中互相冲撞。有时它们向固定的星星冲去，有时又向地面倾斜。它们掠过云层，云层就着火并开始冒烟……

——《希腊神话与传说·法厄同》①

五十年代，新中国诗坛升起过一朵奇异的云。在南方，它那样明朗、清新而豪迈；在北方，它又是如此地充满生命的大欢喜。它就是年青的诗人和士兵——公刘的歌声，带着如云的异彩，如水的真情，这样虔诚又这样亢奋地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可是很快，这朵云消失了，这歌声沉寂了。那样突然，仿佛又那样理所当然。二十二年后，诗人，已经五十岁出头的诗人回顾说：“过去的三十年，竟有多一半的时间我被驱赶于流沙之中；生命为大饥渴所折磨，黯哑了。”然而“歌声多情，歌声有义，歌声并未弃我而去，只是由于缺乏活命的水，连它都变

成火了。”②

从云到火。从云——到火！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文学现象。考察这如火的云和如火的火，我们可以想见那灼热、那白炽，想见大地的饥渴和流沙的猖獗，并欣喜于失而复得的春天、树苗和清泉，进一步则深深地思考：从诗的命运到人民的命运。

一 诗歌在这一天复活

是不是从这一天起你又开始写诗了？

朴素如全中国的花圈，悲哀如全中国的肝肠；

但愤怒又象炸弹，锐利又象刀枪，

打！打偷花圈的贼！打窃国的“四人帮”！

——《星》

是的，从这一天起公刘又开始写诗了。这一天，是“中国以哭当歌和以歌当哭的日子”。读着《誓》、《白花》、《骨灰呵骨灰》等这一组诗，这一组曾经在“地下”流传的诗，谁也想不到它们竟是出自公刘之笔。认不出来了，难道这就是写过《边地短歌》和《上海抒情诗》的那个公刘么？欢快和豪迈象轻云一般飘散了，这里是“沉重的云，沉重的泪，沉重的步子，更其沉重的是忡忡忧心事”（《誓》）。不，这里没有丝毫值得惊诧的地方——如果我们还能想到历史，想到从《在北方》（1957）到《白花·红花》（1979）这两本诗集所反映的历史的话，如果我们还能刻骨铭心地记得那些全民族大悲大痛的日子的话。

悲痛产生最好的诗，愤怒出诗人，古今如此，中西皆然。就一个诗人而言是这样，就一个民族而言更是这样。在当代中国，缪

斯选择了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和四月作她的复活节，这决不是偶然的。狄德罗说过：“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天才是各个时代都有的；可是，除非待有非常的事变发生，激动群众，使有天才的人出现，否则有天才的人就会僵化。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⑤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动乱之后，正是一个伟人的逝世这样一个“非常的事变”激动了群众，才产生了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标志的全民族的情感大爆发，产生了中国诗歌、中国文学复苏的契机。“是谁夜半陨落？人海溅起泪浪！铁骨进化火种，沛然自天而降！”（《星》）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空气中的火药味，确已如预言那样憋得很足，很足”（《哀诗魂》）。一触即发，轰然腾起！公刘当时仍身受政治重压，没有写诗的权利，但他的歌声也从火中复活了，“如火凤展翅——在那乌云漫天的日子！”（《诗的复活》）

这个日子对于诗，对于公刘的诗，意味着什么？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论述。诗的火焰中燃烧着两种最基本的元素：爱和恨。对周总理，这爱象大地一样深沉，象白花一样纯洁。“每一条江河呵，每一个土坡，大张开颤抖的胳膊；伟大的周恩来呵，不朽的共产主义者，人民的心窝，就是你的陵墓与棺槨！”（《骨灰呵骨灰》）对正在纵马作乐的“叶卡杰林娜二世”及其“宠臣和骑士”，诗人痛苦地宣布：“该回车间去了，去锻造新诗——象锻造砍马蹄的刀子！”（《我做了一个恶梦》）在五十年代，诗的云朵里也蕴含着爱与恨这两种电荷：“对待我们的亲兄弟，对待自己人，我们的每一滴水，都是一张柔情的嘴唇，而对待侵略者，对待叛徒，对待那帮放火烧寨的敌人，我们就掀一个浪头，

叫它灭顶！”（《母亲澜沧江》）那时候爱是爱得那样单纯和明朗，恨又恨得那样旗帜鲜明，那样充满了豪迈的信心。二十年后，爱里渗透了庄严的苦涩和无言的哀痛，包孕着对民族命运无穷的忧虑；恨里压抑着满腔的怒火，分明是一个受辱者“咬住嘴唇”的抗议。这里包含着一个明显的结论：动乱使民族的情感变得复杂了，使民族的性格、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都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仿佛相当集中地在公刘的诗作里表现了出来。在公刘的新作里，爱和恨采取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组合方式和显示方式。它们更加紧密地互相交织、渗透，相反相成，不可分离。在赞美，同时也在控诉；在颂扬，其实也在揭露。恋歌里迸着血丝，诅咒中流动着灼热的情感。是不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假恶丑曾经冒真善美之名以行，它们之间的搏斗是那样错综复杂？或许是由于假恶丑曾经得势于一时，至今死而不僵，诗人为捍卫真善美不得不时时伴随着对它们的抨击？无论如何，炼狱之火已经把人们的爱和恨熔铸成一个整体，人为地把歌颂与暴露割裂开来的理论在实践面前已经通不过了。

在诗人的新作里，爱憎感情都表现得更为真诚。由于真诚，诗人不再掩饰自己的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如果说，在五十年代的一些诗里，情感的抒发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天真的夸饰，或者由于经过某种既定模式的过滤而略显空洞和单调，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大都是直接从诗人心里掏出来的歌，是诗人的灵魂在歌唱。公刘认为“没有灵魂的诗是诗的赝品”，“我把好诗当好友，一如结交知音，他们不仅有血有肉，也有活的灵魂；他们大哭大笑，真爱真愤，日日夜夜吸引我的眸子，占领我的心”（《为灵魂辩护》）。真诚带来的不一定就是单纯，恰恰相反，真诚才有可能显示诗之魂的多侧面和多层次。由于诗人意识到“说真话”对于诗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至关重要，我们才终

于能够在今天的诗歌中发现当代人情感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④

诗人新作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哲理性的加强。正如少年人的爱是纯真的、激情澎湃的，而成年人的爱是成熟的、深沉严肃的一样，饱经忧患的民族从迷信中醒来，情感中积淀了新的理性的因素。“思索”——成了一切艺术（包括诗歌这一“最感情”的艺术）的鲜明特征。无论是爱，无论是恨，都由于那痛苦的思索而变得深刻和丰富。合金钢因有渗透其中的新元素而具有纯钢所没有的、更好的品质。哲理溶合于诗意之中，从而提高了诗。理性沉积在有血有肉的情感里，使诗人的歌唱染上沉重的霜风秋色，爱和恨都闪出一种冷峻的光芒。思索需要冷静，但是动乱留给诗人脑海的是纷纭繁杂的感情画面，使诗人产生澎湃不息的热情。并不是每一首诗都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冷和热、理和情的关系的。这二者的辩证统一，正是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情的关键。

是的，从这一天起他又开始写诗了。“这一天”里浓缩着太多太多的历史能量，从政治到诗，都孕育着巨大的转折。伟大的痛苦里复活了诗的新生命，一切情感都由于这痛苦的洗礼而获得深沉的力量。这痛苦甚至使希望也变得沉重了——而沉重的希望才更像是希望！

二 沙哑然而坚定的春歌

假如春天也学会了欺骗，
那么大地就会说：这不是真的春天！
锄头会生锈，
拓荒者将带走收获的预言。

——《假如……》

一九五四年十月，公刘曾这样歌颂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贫穷和苦难将被遗忘，幸福的道路迎着祖国开放；一百零六条柱石，为我们撑了一座真正的地上天堂。”（《在这庄严的时刻》）二十四年后，诗人却为这样“幼稚的狂想”感到“脸红”，他写道：“亲爱的同志，请多多原谅，原谅我那时还太年青，太爱夸张；当战争的暴风雨刚刚隐退，沉雷还在某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原谅我，不该拣起轻柔的羽毛，结巢于诗歌的‘消息树’上”（《献给宪法第十四条的恋歌》）。不对，不是我们的诗人太年青，而是我们的共和国太年青，社会主义制度太年青。我们知道，五十年代初期，多少老诗人写下了更为天真得多的诗句，他们充满幸福憧憬的歌声显得多么稚嫩呵！倒是当时的一批“少年布尔什维克”，以他们敏感的年青的心，嗅出了空气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官僚主义灰尘，为后来的大灾难竖起了最初的“消息树”。是的，战争的暴风雨刚过，正是它洗涤了神州大地的污浊，使新中国象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刚健清新，好冲动而无所畏惧。另一方面，又正是胜利的彩虹掩盖了沉雷在某处的咬牙切齿，人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听到这种不和谐的音响。直要到“等待若干岁月”和“经历几许风浪”之后，人们才发现已经为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付出了太可怕的代价。

于是诗人再次歌唱春天，歌唱这失而复得的春天，可是春天的形象变得多么不同了啊！

……春天来得很晚很晚，
为什么迟到了？这问题也许留待子孙钻研；
不过我们深知：春之路曲折而又艰险，
脚掌划破了，一万缕血丝结一个茧；
然而玫瑰花在额头盛开，好一顶荆棘的王冠！

褴褛衣衫，通体焕发着光艳和新鲜……

——《爆竹》

这是一个遍体鳞伤却又坚定乐观的春天。她怀抱丝弦，为理想而歌，又一手执剑，为信念而战。春天里不仅有熏风，有阳光，有鼓突的叶芽和蒲公英毛茸茸的眼睛，而且有残雪冻雨，有腐草枯萍，甚至还有血痕，有恶梦，有孽火余烟。这是真实的春天。两组截然对立的意象相当触目地交织在一起，使诗产生一种“张力”，象一根绷紧的弦，随时要把什么东西弹开去。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旋律，那就是：警惕“倒春寒”！不能让悲剧重演！诗人固执地重复这个旋律，时而大声疾呼，时而委婉地讽谏，时而语重心长地提醒，时而冷峻地指斥……

是什么原因使诗人反复地吟唱这一主题？是不是由于在冬天里太久太久地盼望阳光，即使春天里的一丝寒气，也使人毛骨悚然？不能用“心有余悸”这种现成的语言来解释。它不能概括人们复杂的心理，也完全忽略了客观现实的状况。春天里的残雪和冻雨，显然不是诗人心造的幻影。“左”的倾向，“左”的势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懒洋洋的草绳，而是货真价实的还想咬人的蛇。公刘怀着极大的蔑视和极其沉重的愤懑来描写这些玷污春天的丑恶现象：“它不是冰的碎块，这些半顽固半圆滑的颗粒！水银柱上，它也选择了最理想的位置，既不是0°，又几乎没有距离；……开始了，我们这里，开始在下冻雨。”（《冻雨》）在愤懑的同时又怀着极大的担忧：“但愿我不会那么愚蠢，因为地上有腐草，池中有枯萍，就宁可祈求冬天重新君临，赞美那冰雪的统一与纯正。”（《但愿我不会那么愚蠢》）在担忧的同时又怀抱着如此执着的信念，如此强烈的献身精神：“怕什么料峭三月，气流变幻！但愿我是一朵大胆的小花，请燕子衔

了去吧，献给真正的春天！”（《燕子书桌》）庄严的使命感升在诗人心头：“我的使命是传达大地的信息：你要坚强！你要贞洁！你要警惕！”（《冻雨》）一切关注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人们，都会为这拳拳之心所感动，为这些深沉而又激愤的诗句所震撼。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多么复杂而又深刻的心态。“我不要！”这句话里浓缩了全部的痛苦、失悔、愿望、忧虑和信念。恶魔还在骨灰盒上的阴风里狞笑，“这当然是一个梦，但它常来袭扰；每逢秋声透枕，便有一片喧嚣”（《骨灰盒上的阴风》）。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只要产生恶梦的原因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没有得到根本的消除，它的影子就不会从人们心头飘散。公刘写道：“弥漫在前后左右的，仍然是那种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不安全感。……然而，从来也没有被吓死的战士，战士只能饮弹而亡。象我这样由党和人民解放出来的幸存者，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三中全会精神向前进，绝不后退半步。”于是，在为捍卫春天而战的歌声里，年轻战士的豪迈被代之以老兵的沉郁悲壮；不是欢欣鼓舞的雀跃奔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坚韧跋涉；不是一片天真烂漫的憧憬，而是肩着因袭的重担艰难向前。骆驼，北方的骆驼，这一为诗人非常喜爱的形象，又多次出现在他的诗作与文章里：

假如七、八年再来一次流沙，我就再变成骆驼，再默默地负重蹒跚，再期待着有朝一日走出流沙，那时，濡着白沫的丑陋的嘴唇上当然也会再现笨拙的笑容。

但也完全可能因衰竭而倒下。

朋友，你见过大沙漠中死骆驼遗下的骸骨吗？它不是一根两根，而是一堆骆驼死了。但对流沙而言，对习惯于横行无阻的流沙而言，骆驼留下的一堆骸骨也未尝不是一种小小